

·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

刘述先 著

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讲北
演大
丛学
书术



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

刘述先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 / 刘述先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8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ISBN 978-7-301-25126-3

I. ①理… II. ①刘… III. ①儒学-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8439 号

- | | |
|-------|--|
| 书 名 | 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 |
| 著作责任者 | 刘述先 著 |
| 责任编辑 | 黄敏劼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5126-3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195 千字 |
|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2010年1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刘述先先生应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等六家单位邀请担任“第十三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第十四届汤用彤学术讲座”的主讲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和《论超越与内在的回环》的两次学术演讲，受到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大大提高了北大学子对中国哲学和中外哲学比较学习和研究的热情。

我在讲座前一简短的致辞中说：“我和刘述先先生认识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原来我是研究佛教和道教的，对儒学没有什么研究，我开始对儒学有点兴趣，也还是在刘述先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影响下开始的。在与刘述先先生的交往中，我逐渐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专家，而且他确实在努力促使中国传统哲学成为现代的中国哲学，创造着适应现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中国哲学，使之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种哲学体系。”这一看法得到广大学术界的认同。

我们和各位“蔡元培学术讲座”与“汤用彤学术讲座”的主讲教授商定，希望他们各自编一本与讲题有关的文集，由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版。现在我们已经出版了七八种，述先兄的这本是最近将出的一本。这本文集共收入了述先兄的十篇论文（包括他此次在北大的两篇演讲稿）。在述先兄写的“前言”中已把他的十篇论文的主旨都向读者说清楚了。因此，不需我再多说什么，否则会是画蛇添足了。

我认识述先兄已经三十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夏天在哈佛大学，我与述先、维明有了较多的接触。因而对中国当代新儒家有了一点了解，也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兴趣。正巧这年夏天要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写了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我在会上发言后，述先兄在他写的一篇《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中有如下一段话：“据杜维明告诉我，汤一介本来提议能合写一篇论文，维明觉得自己思想背景和他不同，没有答应他的建议，但等一介的论文完成之后，维明才觉得与他合作写论文不一定有什么太大困难。这次我去哈佛访问时与一介谈，了解他如今正在整理他父亲汤用彤先生的遗稿，并搜集资料出熊十力先生的全集，其中熊著《尊闻录》的原版已通过维明的关系在‘时报出版公司’重印出来。汤一介讲完之后，在讨论时间，（台湾）冯沪祥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问他讲的这套究竟与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关联。汤一介的回答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之间至少可以看出三点契合之处：（a）二者都重实践；（b）二者都取理想主义态度；（c）马克思主义有所谓矛盾统一律，过去毛泽东强调斗争，以致产生偏向，如今应该强调和谐，乃和儒家有互相契合之处。”我记得当时还说了这样几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讲

的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我有这样一段话，是我当时仍心有余悸，怕回国后，被人告发为“反马克思主义”。现在，我国的学术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会再有那样的顾虑了。2010年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时，我提出儒学院将开展三个大的研究课题：“中国经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史”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经学史”已于2011年启动；“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也于2012年启动，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直没有找到项目主持人，原来希望赵敦华教授来主持，但他另有研究课题，不可能再兼此课题了。恰巧今年6月杜维明教授来我家，我谈到儒学院三大研究课题时，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因没找到合适的主持人还未正式启动，维明说他愿意承担。对此，我太高兴了，有维明来任此项目的首席专家再好不过。这可以说，它将会成为我们和维明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开始吧！如果将来有可能我们也很想与述先兄有合作的项目，这当然要看机缘了。

此文集中述先兄研究的论题，我也曾有涉及，如“天人合一”“内在与超越”“儒学的宗教性”等等。但我的研究多偏重在这些问题对中国历史和实际的意义，不像述先兄深入到这些问题的人生精神境界的本体价值和天地（宇宙）本体理论意义层面，而且述先兄特别关注这两者的统一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在我读《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时体会到述先兄治学的世界眼光。在当前人类社会文明呈现“全球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文化“多元化”更加突显，这可用“理一分殊”来解释。《论孔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一贯之道》不仅详尽分析孔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深入探讨了儒家自孔子以来的心性论、天道论而至儒学所关注的“终

极关怀”的宗教性意义等等问题。我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也注意到《论语·公冶长》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段话。我认为，子贡这段话也许恰恰说明“性与天道”问题是孔子特别重视的问题，否则子贡是不可能说出上引的那段话的。述先兄此文，层层分析了《论语》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对大家研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大有帮助。在孔子之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中多处有论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因而“天人合一”思想为当前中外学界所关注。例如钱穆先生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中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屡次谈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在于此。”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在《〈儒藏〉的世界意义》中说：“曾经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已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学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由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中对“六经”各经之主旨都有说明，其中说到《易》时有这样一句：“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是说明儒家自孔子至孟子之间已充分注意到“天人合一”的理论意义了。这问题在述先兄的论文中多有发明。收入本文集中的十篇论文可说篇篇对我们都有启发。

汤一介

2012 年 8 月 15 日

附

“蔡元培学术讲座”和“汤用彤学术讲座”是为纪念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分别于1998年和1997年创办。每年由北京大学校长签发邀请函，邀请海内外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就其所关心的学术文化问题发表演讲。至2011年，“蔡元培学术讲座”和“汤用彤学术讲座”已分别连续举办十三届和十四届，在北京大学校内外已产生广泛影响，并成为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一项传统学术文化活动。蔡元培学术讲座、汤用彤学术讲座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书院、国风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并长期得到北大校方和国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旭先生的大力支持。

前 言

承汤一介教授推荐我到北大作“第十三届蔡元培学术讲座”与“第十四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并编一论集。这是我的殊荣，自乐于应命。我提议讲一介兄和我共同关注的两个论题，蔡元培讲座讲《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这也用作论集的书名），汤用彤讲座讲《论超越与内在的回环》。

论集共收十篇文章，依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篇文章，直接切入讲演的主题。第二部分有五篇文章，回归传统的资源并讨论其现代的涵义。第三部分有两篇文章，展示具体的例证作典范的重构与诠释。以下再对各篇文章的意涵略作简单的阐释。

开宗明义第一篇：《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轨迹》，介绍了现代新儒学“三代四群”的架构，配合上由1920年起每20年为一波总共四波的发展，就可以看到这一思潮的脉动，以及我在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第四群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作“理一与分殊”“超越与内在”的两个讲座。

然而当代新儒家终必要回归传统儒家的源头活水。儒家哲学的阐发与拓展有三个黄金时代：先秦、宋明与现代。第二部分第一篇率先回归先秦春秋时代对周文疲弊作出回应的孔子。我用《论语》

提供的材料证明孔子的一贯之道不只是曾子所谓的忠恕之道，还内涵了非人格化、默运于天壤间既内在又超越的“天人合一”之道。

接着《先秦儒家之宗教性》一文，我利用《四书》（论、孟、学、庸）与《易传》的资源，讨论先秦儒学的宗教意涵，确定其为对比于基督宗教的“外在超越”之一种“内在超越”形态的精神传统。

然后跳到南宋的朱熹，面对二氏（老、释）的挑战，建构了道统、濂、洛、关、闽的统绪。他的综合以理为只存有而不活动虽不尽理想，而且死时还被诬为伪学。但他到理宗时即得到平反，他的《四书集注》由西元 1313 年到清末 1905 年被用作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判准，对传统仕人影响之大为孔子以后一人，洵非虚语。1982 年在夏威夷开国际朱熹会议，当今流行的百科全书多有关于他的长条目，显示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不可忽视。

但科举宗奉的朱子，到明代却受到王阳明的挑战。所谓“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比仅只是过分简单化的标签而已。阳明虽为象山呼冤，仍批评其“粗些”，从不加以征引。他编《朱子晚年定论》，虽未解决问题，反而惹起更大争议，至少显示在主观的愿望上，他仍盼望与朱子的睿识得到调和。他的“最后定见”见之于天泉证道的“四句教”。王门后学之“参之以情识”“荡之以玄虚”，造成重大的流弊而引起反激，却不能完全责怪阳明本人的偏失。

第二部分最后一篇：《黄宗羲心学的定位重探》长文，总结了近二十年来对梨洲研究的成果，重新肯认我 1986 年出版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一书提出的见解。首先我不同意牟宗三先生的意见，认为刘蕺山的诚意慎独教还能维持超越的层面，黄宗羲却堕落成为“自然主义的气化论”。他以蕺山为最后一位宋明理学家。但我的

书证明，梨洲一生忠于乃师所教，虽自阳明以来“内在”的层面加强，但从未完全失落“超越”的层面，故梨洲才是最后一位宋明理学家。

但我最重要的发现是，梨洲的《明儒学案》改变了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学三变、教三变”的说法，讲成“前后学三变”的说法。最后一变虽恭维阳明修养工夫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却无与于教，也无与于学。为何梨洲要做这样的改变呢？原来他要把阳明的致良知教当作“权法”，蕺山的诚意慎独教才可以取代之成为“终教”。我的结论是，《明儒学案》根本不是从王学的视域下写出来的一部书，而是梨洲根据蕺山简择阳明从修正王学的观点写出来的一部书。到了清初，陈确、颜元、戴震才完全失落了超越的层面，造成典范转移的效果。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只看到道学的延续，没有看到“典范转移”的实际情况。故我不同意冯友兰的阐释。梨洲成为无意中终结了一个时代而下开了另一个时代的悲剧性人物。

第三部分又回到当代新儒家的视域。开祖熊十力恢复了“性智”的超越层面的体认；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精神上继承了这样的睿识，并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的刘述先、杜维明极力维护既内在而又超越的体证，并在全球意识觉醒下作出儒家哲学的典范重构与诠释。

接着《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一文是2011年底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作的主题演讲。此文明言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任务即面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挑战作出回应。为了存亡继绝，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未必一定要走西方主流的路子。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

三由黑格尔、康德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四位旅居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附录备有我个人著述的专书目录作为参考之用。

目 录

序.....	汤一介 3
--------	-------

前言.....	9
---------	---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轨迹.....	1
-----------------	---

理一分殊与全球地域化.....	16
-----------------	----

论超越与内在的回环.....	41
----------------	----

* * *

论孔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一贯之道	
---------------------	--

——一个当代新儒学的阐释.....	57
-------------------	----

先秦儒家之宗教性.....	83
---------------	----

道统的建构与朱子在宋明理学中地位的衡定.....	102
--------------------------	-----

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	118
----------------	-----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重探.....	143
-----------------	-----

* * *

全球意识觉醒下儒家哲学的典范重构与诠释.....	169
--------------------------	-----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192
--------------------	-----

附录 专书目录.....	212
--------------	-----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轨迹

1986年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确定“现代新儒家思潮”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由方克立、李锦全主持。^①在这一冲击之下，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在1993年也开始做“当代儒学主题研究计划”，每三年为一期，现在换了个名称，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②海峡两岸展开了良性的学术竞争、交流互动，成绩斐然。从1986年到现在不觉已超过20年，我自己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参与者与研究者，愿意在这里提出我自己的省思。

1987年9月在安徽宣州首次开全国性会议。经过广泛讨论，首先确定了一个10人名单：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勱、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后来老一代又补上了马一浮，较年轻一代则加上了余英时、刘述先、杜维明，最后还补上了成中英。正因为一开始大家对“新儒家”并没有一个清楚

^①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参见李明辉：《“中央研究院”“当代儒学主题研究计划”概述》，《汉学研究通讯》总第76期（2000年11月），第564—571页。

的概念，过去也很少人用这一个词，所以澳洲学者梅约翰（John Makeham）认为，把“新儒家”当作一个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倒溯回去重新建构的结果，这种说法不无他的见地。^①现代新儒学在90年代忽然成为显学，甚至在西方引起回响。白安理（Umberto Bresciani）出版了第一部全面介绍与研究这一思潮的英文论著。^②他也接受前面提到的那份15人名单。这份名单虽不很理想，却是迄今为止海内外主流意见公认的名单。我就这一条线索，综合各家之说，提出了一个“三代四群”的架构^③：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马一浮（1883—1967）、张君勱（1887—1969）。

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钱穆（1895—1990）、方东美（1899—1977）。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1930—）、刘述先（1934—）、成中英（1935—）、杜维明（1940—）。

把这个架构与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四波——由1920年开始，每

① Cf. John Makeham. "The Retrospective Creation of New Confucianism", in *New Confucianism: A Critical Examination*, edited by John Makeh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25—53.

② Umberto Bresciani, *Reinventing Confucianism: The New Confucian Movement*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1).

③ 参见刘述先：《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修订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第137—138页。

20 年为一波——发展配合起来，就可以把握到这一思潮的脉动。

首先要对所用的名言作一简要的概说。“儒家”一词有诸多歧义。“制度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随清廷的灭亡而终结。但“精神的儒家”(spiritual Confucianism)并没有死亡。先秦的孔孟是第一期，宋明的程朱陆王是第二期，当代新儒家是第三期，正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另外还有“政治化的儒家”(politicized Confucianism)，自汉代以来的当政者即利用儒术统治天下，如今新加坡实行柔性的威权体制，还有相当吸引力。而“民间的儒家”(popular Confucianism)，被社会学者认为乃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造成经济奇迹背后的真正动力之所在，现在还展现着巨大活力。四者互相关联而有分别。很明显，我们的探索只能集中在“精神的儒家”，特别是在哲学的方面。而前面提到的“现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是大陆流行的术语，取其广义的意思。台湾则流行“当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一词，取其狭义的意思：熊十力是开祖，第二代是他的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两个概念和词经过这样清楚的界定以后，可以并行不悖，不会构成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新儒家对“五四”运动作出回应。40 年代新儒家尝试创建自己的哲学系统。60 年代港台的新儒家由文化的存亡继绝转归学术，为之放一异彩。80 年代海外新儒家晋升国际，倡议与世界其他精神系统交流互济。这便是现代新儒家思潮发展的指向。

就 20 世纪来说，20 年代是第一波，关键人物是梁漱溟与张君

励。梁漱溟被公认为当代新儒家的先驱人物，但很少人注意到，他的思想形成几乎与“五四”同时，其构思与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实始于1919年6月。^①他1920年就在北大演讲，讲词在《北大日刊》连载发表，但未完成，也未定稿。他的书在1921年先由财政部印刷局付梓，但要到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新版，这才洛阳纸贵，名噪一时。他把问题放在整套文化哲学的架构下来考虑。他认为人类基本上有三种意欲：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虽然他年轻时最向往佛教的解脱道，但后来感觉到印度与中国文化有早熟之弊，于是他才娶妻生子，作儒家的志业，为国家民族文化的持存而努力。他主张在现阶段，首先要毫无保留地全盘西化，但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西方那种专讲功利竞争的文化不免漏洞百出，就要转趋中国重视人际关系、社会和谐的文化。到最后人终不能避免生死问题，乃要皈依印度的解脱道。但梁漱溟并没有说明，这样的转变如何可以在实际上做得到。在“文革”时期，他展现了儒者的风骨。“文革”以后，出版《人心与人生》，又回到原来的观点，以为必须回归中国文化强调社会和谐的泉源。梁一生尊崇孔子。西方学者艾凯（Guy Alitto）著书论梁，书名《最后的儒者》。^②等到他有机会在1980年亲访梁

① 参见王宗昱：《梁漱溟》，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第308页。

②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